卤簿“相风”小考
——兼论《西京杂记》“甘泉卤簿”条之造成

张　琪

提要：以往基于《西京杂记》“甘泉卤簿”条认为西汉帝王卤簿已有相风的结论难以成立。“甘泉卤簿”条最初乃是两晋好事者以《中朝大驾卤簿》或其同源材料为蓝本，损益造作而成，后为葛洪采入《杂记》，既不能据此讨论汉制，也不能准确地反映晋制。不过，《杂记》此条与《晋书·舆服志》“中朝大驾卤簿”所出同源，其文字错讹虽多，但仍具校勘价值。从现有材料来看，相风进入卤簿或晚至西晋。从西晋到宋代，相风在大驾卤簿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日益消泯，最终于南宋退出大驾卤簿仪仗，后代大驾卤簿亦不再使用相风。

关键词：相风　卤簿　《西京杂记》　《晋书·舆服志》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仪饰部》有“相风”一目，同卷还有“卤簿”“警跸”“钺”“豹尾”“云罕”“鼓吹”等目①，皆与天子出行仪仗有关。“相风”可作“占风”解，亦即人所熟知的风角杂占，相关论著已颇丰厚②，本文不拟讨论。但“相风”作为卤簿仪仗似乎并非常识，研究者对此措意较少。更重要的是，对于相风何时成为卤簿仪仗这一关键问题，前人几乎都信从《西京杂记》（以下简称《杂记》）“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以下简称“甘泉卤簿”）条所记“相风乌车驾四，中道”③，并据此得出汉代大驾卤簿中已有相风的结论。④ 然而，这一说法并

*　张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写作承林子微、庄麦多所指正，复蒙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①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影钞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551 页。

② 相关研究可参看余欣《观风望气：吐鲁番文书残存占候之术钩沉》，《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40—170 页。

③ 葛洪《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223 页。按《杂记》“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条详载汉朝甘泉祭祀的车舆仪仗，整理者将之命名为“甘泉卤簿”，较为允当，本文亦从。

④ 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7—48 页；坂出祥伸《中国における風の観測と観測器具の発達》，《関西大学文学論集》1985 年第 35 卷，第 1—19 页；刘昭瑞《候风乌与相风乌——关于绍兴三〇六号墓铜屋上柱与乌功能的讨论》，《华学》第五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65—72 页；扬之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卤簿图若干仪仗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 年第 2 期，第 114—157 页；等等。孔德明《论〈相风赋〉的兴起及其文化意义》（《昆明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105—110 页）虽对此提出质疑，但只是简单地认为“从本条所记‘汉朝舆驾’来看，（转下页）

不能得到其他两汉文献的支持，《杂记》是否可靠不无疑义。

《杂记》自来不乏前贤垂注，总体而言，学界目前对该书有两方面共识，一是此书乃东晋葛洪假托刘歆之名所造，语涉不经，与正史抵牾处多有；但另一方面，所谓“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①，葛洪编集该书所利用的材料，乃汉晋以来百家短杂、奇要之书，故其中所记秦汉旧事、苑圃器物、典章制度等，往往互见于其他汉晋文献，或为当代考古发现所印证②。程章灿评价《杂记》所包含之史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要求论者在利用该书的材料前须作仔细辨析。

一、《西京杂记》“甘泉卤簿”条考辨

具体到“甘泉卤簿”一条，清人沈钦韩《汉书疏证》“匡张孔马传”条已指出“此书葛洪所序，其大驾卤簿杂入晋制”③，惜点到为止，未作进一步说明。周天游校注《杂记》时，释此条之“都督”“太尉祭酒”“翊军校尉”“建华车”为晋制，作为沈氏所谓“杂入晋制”之证据④。田丸祥幹的《漢代における三駕鹵簿の形成》从“前军将军”“左、右卫将军”并非汉制入手，敏锐地指出《杂记》“甘泉卤簿”条是以西晋皇帝卤簿附会汉代旧制，但另一方面，他因《杂记》与《晋书·舆服志》“中朝大驾卤簿”有所出入，故认为前者所载乃魏晋之际的皇帝卤簿。⑤ 田丸氏此后在《魏晋南朝の礼制と三駕鹵簿》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杂记》“甘泉卤簿”条是“中朝大驾卤簿”尚未成熟的阶段，并将之作为现实行用的制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⑥ 但《杂记》此条若确实反映魏晋之际的卤簿制度，则不应以长安县及京兆府官吏为先导，同时这一观点也难以解释《杂记》与“中朝大驾卤簿”同误等现象(详下)。

关于“甘泉卤簿”，蔡邕《独断》云：“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在长安时，出祠天于甘泉，备之。百官有其仪注，名曰甘泉卤簿。中兴以来希用之。”⑦《续汉书·舆服志》中与车舆相关的内容多源出《独断》⑧，“大驾”条亦不例外，其文曰：“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西

（接上页）录本条者似不是汉人，如是汉人，当言‘本朝’而非‘汉朝’”“《西京杂记》被后人看作小说家言，出自街谈巷说，故不可作为史实”“即使《西京杂记》所记汉大驾有相风法物，……而《晋书·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之法物相风分于两处，与《西京杂记》及刘孝威《行幸甘泉歌》所记不同”。其辨析难称精严。

①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七《新雕西京杂记缘起》，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90 页。

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西京杂记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007—1017 页；程章灿《〈西京杂记〉的作者》，《中华文化》1994 年第 1 期，第 93—96 页。

③ 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17 页。

④ 《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第 232、234、237 页。

⑤ 田丸祥幹《漢代における三駕鹵簿の形成》，《国学院大学院紀要》43，2011 年，第 171—198 页。

⑥ 田丸祥幹《魏晋南朝の礼制と三駕鹵簿》，《古代文化》64（3），2012 年，第 418—435 页。

⑦ 蔡邕《独断》卷下，《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9 页。

⑧ 参看代国玺《蔡邕〈独断〉考论》，《文献》2015 年第 1 期，第 154—166 页。

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①] 刘昭注云：“蔡邕《表志》曰：国家旧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见。”[②] 甘泉泰畤祭祀兴盛于武帝，甘泉卤簿或制定于此时，哀、平时期，随着国家天地之祭移至长安南北郊，甘泉祭祀废圮。[③] 东汉尚难得一见的甘泉卤簿，却在东晋时重见天日，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

田丸祥幹已指出，《晋书·舆服志》（以下简称《晋志》）中载有一份“中朝大驾卤簿”，其文本与《杂记》“甘泉卤簿”非常接近。按《隋书·经籍志》仪注类著录“《晋卤簿图》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大驾卤簿》一卷”，又《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中朝卤簿图》、《太平御览》车部及兽部并引《晋中朝大驾卤簿》、《隋书·礼仪志》引《晋氏卤簿》，章宗源认为以上同为一书[④]，可从。从“中朝”来看，此文本出自东晋人之手，记西晋制度[⑤]，《晋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内容颇完整，当源于此。[⑥]《杂记》“甘泉卤簿”条与“中朝大驾卤簿”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能简单地以晋承汉制来解释，仔细辨析《杂记》“甘泉卤簿”中的职官可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与西汉制度不合。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并非田丸祥幹所认为的行用年代不同所致。下文先将《杂记》“甘泉卤簿”条与《晋志》“中朝大驾卤簿”的文本进行比对（表一），以明二者之同源关系。某一文本溢出另一文本的职官，皆以下划线标出，未加下划线的部分则表明在另一文本中皆可找到对应内容。可讨论之处标以粗体，并在“备注”一栏中加以辨析。

表一（数字为笔者所加）

《杂记》“甘泉卤簿”⑦	《晋志》“中朝大驾卤簿”⑧	备注
1 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司马车，**		●“司马车”仅见于《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车部“司马车”目，然其释文引崔豹《古今舆服注》云：“大章车，所以识道程也，起于西京，亦曰记里车。”[⑨] 并未出现“司马车”。陈禹谟刻本“记里”二字作“司马”[⑩]，按《玉海》卷七十九车服引崔豹《古

① 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648 页。
② 《续汉书·舆服志》，第 3649 页。
③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 121—177 页。
④ 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十一，王颂蔚批校、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 年，第 349 页。
⑤ 张金龙认为《中朝大驾卤簿》制定于晋武帝太康元年（《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58—264 页）。
⑥ 臧荣绪《晋书》已有《舆服志》乃学界共识，《文选·籍田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有数条言及“大驾卤簿”，其内容亦见于唐修《晋书·舆服志》“中朝大驾卤簿”，章宗源和汤球据此指出唐修《晋书·舆服志》多本臧书（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一，第 31 页；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0 页）。但无论是臧书还是唐修《晋书》，其中关于西晋大驾卤簿的记载皆可追溯到东晋编撰的《中朝大驾卤簿》。关于《晋书·舆服志》的史源，还可参看黄桢《中古天子五辂的想象与真实——兼论〈晋书·舆服志〉车制部分的史料构成》，《文史》2014 年第 4 期，第 55—73 页。
⑦ 《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第 219—224 页。
⑧ 《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757—759 页。
⑨ 《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影钞本，第 627 页。
⑩ 《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陈禹谟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天津图书馆藏，第 28 册叶八。

（续表）

《杂记》“甘泉卤簿”	《晋志》“中朝大驾卤簿”	备注
驾四，中道。辟恶车，驾四，中道。记道车，驾四，中道。**靖室车，驾四，中道。**		今注》云：“大章车，所以记道里，起于西京，亦曰记里车。”① 可知陈本径改“记里”作“司马”②。而《杂记》此处若确作“司马车”，则其识道程之记里功能与下文“记道车”重复。《杂记》“甘泉卤簿”条间有讹字（详下），疑“司马车”为“司南车”之讹。《晋志》云：“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南指。大驾出行，为先启之乘。”③《宋书·礼志》云：“指南车，……至于秦、汉，其制无闻。……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④ 据此，则西汉时司南车之制无闻，西晋时重兴，为大驾先启之乘。下文《晋志》第 18 条有“次司南车，驾驷，中道”。 ●“靖室车”当对应《晋志》第 3 条之“静室令”，颜师古注《汉书》引应劭注云：“旧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静室令先案行清净殿中，以虞非常。”⑤
2 象车，鼓吹十三人，中道。	2 先象车，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3 式道候二人，驾一。左右一人。	3 次静室令，驾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驾一，分左右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执金吾属官有“式道左、右、中”⑥，《续汉书·百官志》“执金吾”本注云：“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还持麾至宫门，宫门乃开。”⑦ 式道候二人似不合汉制。
4 **长安都尉四人**，骑。左右各二人。长安亭长十人，驾。左右各五人。长安令，车驾三，中道。	4 次 **洛阳尉二人**，骑，分左右。次洛阳亭长九人，赤车，驾一，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次洛阳令，皂车，驾一，中道。	●周天游以为长安都尉即京辅都尉，因京兆尹府在长安，故称长安都尉⑧。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元鼎四年（前 113）更置三辅都尉、都尉丞各一人。”⑨ 京兆都尉仅一人，不可能有《杂记》所载之四人。《杂记》之“长安都尉”显与《晋志》“洛阳尉”对应，从下文之“亭长”及“令”来看，皆为县官。

① 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七十九，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 年，第 1527 页。
② 陈禹谟刻本对《北堂书钞》原书多有增删和臆改，说详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69—71 页。
③ 《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第 755 页。
④ 《宋书》卷十八《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96 页。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09 页。
⑥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 732 页。
⑦ 《续汉书·百官志》，第 3606 页。按点校本原标点作“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式道”与“左右中候”之间不应点断。
⑧ 《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第 227 页。
⑨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 736 页。

（续表）

《杂记》“甘泉卤簿”	《晋志》“中朝大驾卤簿”	备注
5 京兆掾史三人，驾一。三分。京兆尹车驾四，中道。	5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桥掾在左，功曹史在右，并驾一。次河南尹，驾驷，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驾一，中道。次河南主记，驾一，中道。	
6 **司隶部京兆从事、都部从事、别驾，一车，三分。**司隶校尉驾四，中道。	6 **次司隶部河南从事，中道。都部从事居左，别驾从事居右，并驾一。**次司隶校尉，驾三，戟吏八人。次司隶主簿，驾一，中道。次司隶主记，驾一，中道。	●汉未见“都部从事”官。周天游校释《杂记》以为“都部从事”乃“都官从事”之误，然误同《晋志》则过于巧合。西晋之“都部从事”仅见于《晋志》，《宋书·沈攸之传》载“晋世京邑二岸，扬州旧置都部从事，分掌二县非违”①，似东晋始置都部从事。《晋书·职官志》载司隶校尉属官有都官从事及部郡从事②，疑《晋书·舆服志》此处为“都官从事”或“部郡从事”之讹。
7 廷尉驾四，中道。	7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并驾一。次廷尉卿，驾驷，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记，并驾一，在左。	
8 太仆、宗正**引从事**，驾四。左右。	8 太仆**引从**如廷尉，在中。宗正**引从**如廷尉，在右。	●《杂记》“引从事”不可解，太仆、宗正属下无从事，当为“引从”之误。
9 太常、光禄、卫尉，驾四。三分。	9 次太常，驾驷，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并驾一。次光禄引从，中道。太常主簿、主记居左，卫尉引从居右，并驾一。	

① 《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第1927页。
②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第739页。

（续表）

《杂记》“甘泉卤簿”	《晋志》“中朝大驾卤簿”	备注
10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贼曹属、仓曹属、户曹属、东曹掾、西曹掾，驾一。左右各三。**太尉**驾四，中道。太尉舍人、祭酒，驾一。左右。**司徒列从，如太尉王公，骑。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鼓吹一部。	10 次**太尉外督令史**，驾一，中道。次西、东、贼、仓、户等曹属，并驾一，引从。次**太尉**，驾驷，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并驾一，在左。次**司徒引从**，驾驷，中道。次**司空**引从，驾驷，中道。**三公骑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	●此段叙三公方阵，颇紊乱无章，根本之处在于太尉、司徒、司空这一三公之制成立于东汉建武时①，不可能出现于西汉卤簿中。且汉初太尉不常设，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省，元狩四年（前 125）改太尉为大司马，宣帝地节三年（前 67）更是取消了大司马之印绶和官属。② ●《晋书·职官志》载：“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秩千石；……兵、铠、士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③ 则太尉属下有“外都督令史”一人，《杂记》之“太尉外部都督令史”及《晋志》之“太尉外督令史”当即此。 ●《晋志》“戟”后脱“吏”字。
11 **中护军**骑，中道。左右各三行，戟楯、弓矢、鼓吹各一部。	11 次**中护军**，中道，驾驷。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一部，七人。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东观书》云：“大将军出征，置中护军一人。”④ 可知汉代之中护军乃权宜之制。具有禁卫性质的中护军起源于曹操霸府，魏晋时方为禁军长官。⑤
12 步兵校尉、长水校尉，驾一。左右。	12 次步兵校尉在左，长水校尉在右，并驾一，各卤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13 队百匹。左右。骑队十。左右各五。**前军将军**。左右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此句对应《晋志》第 16 条。 ●前军将军为晋武官。《晋书·职官志》云：“左右前后军将军，案魏明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272）又置后军，是为四军。”⑥ 则前军将军始置于晋武帝时。

①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9—24 页；徐冲《从“司马主天”到“太尉掌兵事”：东汉太尉渊源考》，《中国史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51—69 页。

② 《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第 725 页。

③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第 727 页。

④ 《续汉书·百官志》，第 3564 页。

⑤ 叶其峰《魏晋十六国的护军、中护军及护军印》，《文物》1990 年第 1 期，第 47—53 页。

⑥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第 740—741 页。

（续表）

《杂记》“甘泉卤簿”	《晋志》“中朝大驾卤簿”	备注
14 射声、**翊军校尉**，驾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14 次射声校尉在左，**翊军校尉**在右，并驾一，各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翊军校尉初置于西晋。《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浚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①
15 骁骑将军、游击将军，驾三。左右二行，戟楯、刀楯、鼓吹各一部，七人。	15 次**骁骑将军**在左，**游击将军**在右，并驾一，皆卤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骁骑将军、游击将军虽见于汉代，但皆为杂号将军，并非常置。《晋书·职官志》云：“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汉杂号将军也。魏置为中军。及晋，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② 知骁骑、游击将军曹魏时方承担起禁卫职能，西晋领命中虎贲。③
	16 骑队，五在左，五在右，队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领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独揭，鼓在队前。次**左将军**在左，**前将军**在右，并驾一，皆卤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	●此句对应《杂记》第 13 条。张金龙已辨《晋志》之“左将军”“前将军”当为“左军将军”“前军将军”，后文有“次后军将军在左，右将军在右，各卤簿鼓吹如左军、前军”可证，其中“右将军”亦当为“右军将军”。④
17 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四。前黄麾骑，中道。	17 次黄门麾骑，中道。次黄门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驾驷。	
18 自此分为八校。左四，右四。	18 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并熊渠、佽飞督领之。次司南车，驾驷，中道。	

① 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二《职官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147 页。
②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第 740 页。
③ 参陈苏镇《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67—85 页。
④ 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 235 页。

（续表）

《杂记》“甘泉卤簿”	《晋志》“中朝大驾卤簿”	备注
19 护驾御史，骑。左右。御史中丞驾一，中道。谒者仆射，驾四。	19 护驾御史，骑，夹左右。次谒者仆射，驾驷，中道。次御史中丞，驾一，中道。次武贲中郎将，骑，中道。	
20 武刚车驾四，中道。九斿车驾四，中道。云罕车驾四，中道。皮轩车驾四，中道。闟戟车驾四，中道。鸾旗车驾四，中道。**建华车**驾四，中道。	20 次九游车，中道，武刚车夹左右，并驾驷。次云罕车，驾驷，中道。次闟戟车，驾驷，中道，长戟邪偃向后。次皮轩车，驾驷，中道。次鸾旗车，中道，**建华车**分左右，并驾驷。	●《晋志》云：“建华车，驾四，凡二乘，行则分居左右。”① 周天游已辨“建华车”为晋制②。
21 虎贲中郎将车驾二，中道。护驾尚书郎三人，骑。三分。护驾尚书三，中道。	21 次护驾尚书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驾部在左，中兵在右，并骑。又有护驾尚书一人，骑，督摄前后无常。	
22 **相风乌车**驾四，中道。自此分为十二校。左右各六。	22 次**相风**，中道。次司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时车，左右有遮列骑。	●“相风”详下文。
23 殿中御史骑。左右。典兵中郎骑，中道。	23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摄前却无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监，并骑。	

① 《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第 755 页。
② 《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第 237 页。

（续表）

《杂记》“甘泉卤簿”	《晋志》“中朝大驾卤簿”	备注
24 **高华**，中道。罼罕。左右。节十六。左八、右八。御马。三分。华盖，中道。自此分为十六校。左八、右八。刚鼓，中道，金根车。自此分为二十校，满道。	24 次**高盖**，中道，左罼，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节郎各四人。次华盖，中道。次殿中司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细楯一行在弩内，又殿中司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摇鼓，中道。次金根车，驾六马，中道。	●《杂记》之“高华”难以解通，周天游认为当同《晋志》作“高盖”，为车名。① 《汉书·于定国传》云：“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② 当以“高盖”为是。
25 **左卫、右卫将军**。华盖。自此后麋烂不存。	25……金根车建青旗十二，**左将军**骑在左，**右将军**骑在右，……次曲华盖，中道。	●《杂记》之左、右卫将军为晋制。《宋书·百官志》云：“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二汉、魏不置。晋文帝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武帝初，分中卫置左右卫将军，以羊琇为左卫，赵序为右卫。”③ 张金龙指出《晋志》之“左将军”“右将军”当为“左卫将军”“右卫将军”，而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以为此处当为“左军将军”“右军将军”，误。左右卫是西晋最重要的禁卫军，在《中朝大驾卤簿》中见不到左、右卫将军是非常奇怪的，侍卫金根车的只可能是左、右卫将军。④

经上表之比对，可以发现《杂记》“甘泉卤簿”无论是仪仗排列的顺序还是具体职官，都与《晋志》“中朝大驾卤簿”近乎一致。另外，从划线部分来看，《晋志》有不少溢出《杂记》的职官和仪仗，记载也更为详细。如第 5 条，《杂记》“京兆掾史三人”对应《晋志》之河南中部掾、河桥掾、功曹史，而《杂记》不言京兆掾史三人具体职位，颇可疑。第 21 条《杂记》亦略去护驾尚书郎的具体职名，或因《晋志》中的都官郎、驾部郎、中兵郎皆非汉官，既无法照搬，临时又难以生造。又如第 6 条，《杂记》并未指明京兆从事、都部从事及别驾在队列中的具体位置，仅含糊地称“三分”。上表已指出《晋志》“都部从事”或有讹误，《杂记》与《晋志》同误，更可证其与《晋志》文本所出同源。以上所举及上表备注栏之考辨皆表明，《杂记》“甘泉卤簿”条绝非汉代文本，也不是简单的“杂入晋制”，而是后人以晋朝

① 《西京杂记》卷五《甘泉卤簿》，第 239 页。
② 《汉书》卷七十一《于定国传》，第 3046 页。
③ 《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第 1248 页。
④ 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第 236 页。

卤簿为蓝本造作出来的，对于伪造者来说，删减省略是较凭空增益更易操作的。因此，无论是将之视为汉制还是晋制，皆不可取。不过，《晋志》成书晚至唐代，《杂记》固然不可能直接源于《晋志》，此条最初应是两晋好事者据《中朝大驾卤簿》或其同源文本增损附会而成，后为葛洪采入《杂记》。

《杂记》“甘泉卤簿”错讹脱漏之处多有，如第 10 条“司徒列从，如太尉王公，骑。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据《晋志》当点断为“司徒（列）〔引〕从如太尉，（王）〔三〕公骑令史、持戟吏（亦）各八人。”又如第 13 条，《杂记》“队百匹。左右。骑队十。左右各五。前军将军。左右各二行”一句，语序有颠倒之处，当如《晋志》先言“骑队”，再言队之马数，《杂记》又未言“前军将军”为“驾”或“骑”，文意显有缺失。值得注意的是，《杂记》“甘泉卤簿”虽不足以作为讨论西汉制度的凭证，但其文本既与《晋志》“中朝大驾卤簿”所出同源，故可为《晋志》校勘提供线索。如《晋志》第 16 条（对应《杂记》第 13 条）之“前将军”当作“前军将军”，学者已指出《晋书》常误前后左右军将军为前后左右将军，前者为实任，后者为虚号①，而《杂记》恰作“前军将军”。又如第 25 条，《晋志》之“左将军”、“右将军”，张金龙已指出当为“左卫将军”“右卫将军”，诚为卓见，而《杂记》便作“左卫、右卫将军”，可提供一佐证。

二、相风小史：从奉引銮驾到退出卤簿

《西京杂记》的记载不可凭信，且目前所见两汉文献中，尚未出现“相风”作名词，即测风仪器之专称的用例。东汉李尤《舟楫铭》云：“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荦重历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②，其中“相风”作动词解。相风作名词的用法至西晋时方大量出现。除《西京杂记》外，多为学者引以证明汉帝王卤簿已有相风的史料，还有梁代刘孝威《行幸甘泉宫歌》“汉家迎夏毕，避暑甘泉宫。……栈车鸣里鼓，驷马驾相风”③，及萧纲《行幸甘泉宫》“鼓声恒入地，尘飞上暗空。赦书随豹尾，太史逐相风”。④ 但需要注意的是，刘孝威“驷马驾相风”句与《西京杂记》“相风乌车驾四”的表达十分类似，萧梁时期《西京杂记》已流传于世，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颇引此书⑤，刘孝威诗的“本事”很可能正是《西京杂记》。此外，刘氏又有《行行游猎篇》描绘当朝帝王出行，诗云“罕车已戒道，风乌复启行”⑥，其中“风乌”即“相风”，这应当是刘孝威喜用的意象。⑦ 而萧纲诗以“豹尾”与“相风”对

① 柴芃《“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前后左右将军与镇卫四将之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18 年第 4 期，第 213—238 页。
② 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611 页。
③ 刘孝威《行幸甘泉宫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185 页。
④ 萧纲《行幸甘泉宫》，《乐府诗集》卷八十四，第 1185 页。
⑤ 程章灿《〈西京杂记〉的作者》，第 94 页。
⑥ 刘孝威《行行游猎篇》，《乐府诗集》卷六十七，第 970—971 页。
⑦ “相风”这一意象在南北朝隋唐的帝王出行诗中十分常见，其数量众多，难以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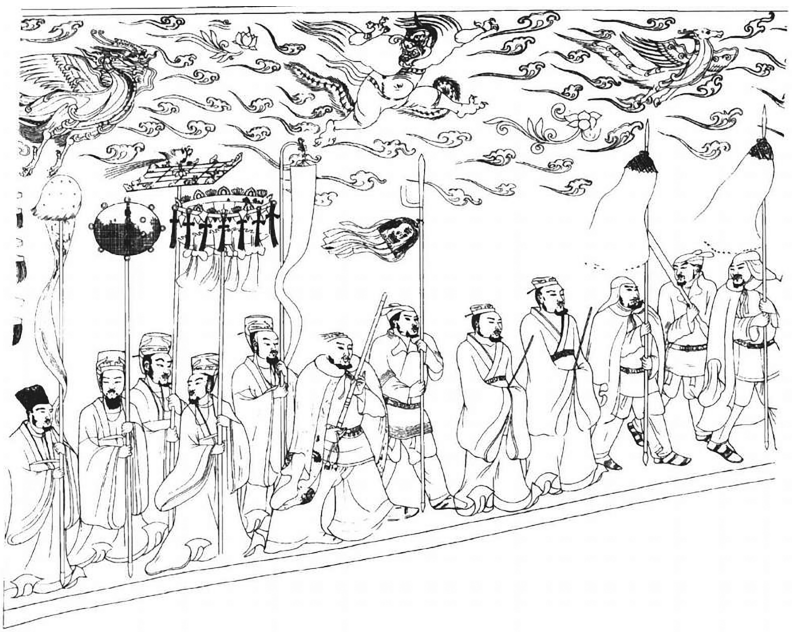
仗，则是两晋以来描写相风的传统。《艺文类聚》引《晋令》云：“车驾出入，相风前引”①，故时人赋文多将奉引銮驾之相风与殿后之豹尾对举。如陶侃《相风赋》：“若乃华盖警乘，奉引先驱，豹饰在后，葳蕤清路，百僚允则，彰我皇度”②，郭璞《南郊赋》：“矫凌乌以侦候兮，整豹尾于后属”③，等等。而与此相对，《甘泉赋》《上林赋》《东京赋》等汉赋在铺陈仪仗时并未提及相风。因此，与其将刘孝威和萧纲的乐府诗当作汉家制度的写实，更妥当的做法是将之视为南朝人对汉世盛景的想象。

由此看来，相风成为帝王卤簿仪仗，或晚至西晋。前人已注意到两晋时期出现了大量以相风为对象的赋文④，表明这一时期对相风的空前关注。可稍作补充的是，张华《相风赋》云：“太史候部有相风在西城上，而作者弗为，岂以其托处幽闲，违众特立，无羽毛之饰，而丹漆不为之容乎。”⑤ 傅咸称张华“以太史相风，独无文饰，故特赋之”⑥。可见当时大部分《相风赋》吟咏的应当是装饰繁复且具有皇家威仪的相风。如孙楚赋云：“树相风于紫庭……神兽盘其根，灵乌据其颠，羽族翩飘罗其侧，翔风萧聊出其间。”⑦“紫庭”即皇廷。可见这种上栖灵乌、下盘神兽的相风，在当时不仅作为奉引銮驾的仪仗，还是宫廷中颇引人注目的景观。东晋庾阐《扬都赋》云：“云虎之门，双竿内启，祥乌司飔，丹墀竟陛”⑧，萧孝俨从幸华林园时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⑨，此乃相风作为皇家景观在江左的延续。这种装饰传统至唐代仍可见，如王胄《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云：“行吟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晨华照城阙，……云开承露掌，吹动相风竿”⑩；韩偓《苑中》曰：“上苑离宫处处迷，相风高与露盘齐”⑪；等等。

行用于卤簿中的相风，其规模或许没有树立于宫中的相风那么高大，但形制应当类似。今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中绘有帝王卤簿图，扬之水已辨认出其中的相风图像⑫，正是根盘神兽，颠据灵乌，与赋文所描述的完全一致（图一左 3）⑬。

相风为帝王专用仪仗，但其行用不限于大驾卤簿。上引《晋令》说“车驾出入，相风前引”⑭，则西晋相风行用的场合当包括了大驾、法驾和小驾。萧梁刘孝威《行行游猎篇》云：“罕车已戒道，风乌复启行”⑮，陈朝张正见《从籍田应衡阳王教作其二》云：“属车游绛阙，风乌

①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六十八《仪饰部》，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年，第 1196 页。
② 《艺文类聚》卷六十八《仪饰部》，第 1197 页。
③ 《初学记》卷十三《郊丘》，第 321 页。
④ 孔德明《论〈相风赋〉的兴起及其文化意义》，第 105 页。
⑤ 《太平御览》卷九《天部》，第 47 页。
⑥ 《太平御览》卷九《天部》，第 47 页。
⑦ 《艺文类聚》卷六十八《仪饰部》，第 1197 页。
⑧ 《太平御览》卷九《天部》，第 47 页。
⑨ 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三《萧孝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361 页。
⑩ 王胄《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文苑英华》卷二百四十八，第 1252 页。
⑪ 韩偓《苑中》，《韩偓集系年校注》卷一，吴在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44 页。
⑫ 扬之水《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卤簿图若干仪仗考》，第 115 页。
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49 页。
⑭ 《艺文类聚》卷六十八《仪饰部》，第 1196 页。
⑮ 刘孝威《行行游猎篇》，《乐府诗集》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185 页。



图一

度丹巘”①，按梁朝帝王田猎备以小驾，陈朝籍田备以法驾②，可知南朝法驾和小驾也可使用相风。唐长安年间，沈佺期侍从武则天往洛阳，作《扈从出长安应制》云：“西宾让东主，法驾幸田中。……金麾张画月，珠幰戴相风”③，则唐代法驾仪仗中亦有相风。在三驾卤簿中，与大驾卤簿有关的材料较为完备，可借此一窥相风在帝王卤簿中的演变。两晋以降至宋室南渡前，相风都在大驾卤簿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在卤簿中的重要性并非始终如一。先来看西晋，据《晋志》“中朝大驾卤簿”④，可将西晋大驾卤簿中与相风有关的部分依照队列行进顺序简要归纳如下：

> 洛阳县属官—河南尹属官—司隶部属官—奉引之公卿—八校尉—黄门麾骑—前部鼓吹—司南车—谒者仆射—御史中丞—武贲中郎将—属车—护驾尚书郎—**相风**—司马督、史—五时车—殿中御史、典兵中郎、殿中监—罼、高盖、罕—御史—华盖—殿中都尉、殿中司马、殿中校尉—摇鼓—**金根车**、左卫将军、右卫将军、殿中将军—曲华盖—黄钺车、御麾骑—**相风**。

左右卫将军护卫的金根车，驾六马，由太仆卿御、大将军参乘，即皇帝所乘之车驾⑤，相风在其前后一共出现两次。值得注意的是，从前部相风到金根车之间的仪卫基本由皇帝的近身宿卫殿中诸职构成。司马督、史、殿中将军、殿中校尉、殿中司马见《晋书·职官志》：“二卫始制前驱、由基、强弩为三部司马，各置督史。……更制殿中将军，中郎、校尉、司马比骁

① 《艺文类聚》卷三十九《礼部》，第 703 頁。
② 参看田丸祥幹《魏晋南朝の礼制と三駕卤簿》，第 106—107 页。
③ 沈佺期《扈从出长安应制》，《沈佺期集校注》卷一，陶敏、易淑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60 页。
④ 《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第 758—759 页。
⑤ 《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第 759 页。

骑。”[①] 又据《宋书·百官志》：“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②] 则司马督、史又称殿中司马督、史，其与殿中将军等皆直属左右二卫，是皇帝身边重要的侍从武官。[③]《晋书·职官志》“二卫”条又云：“先是，陈勰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军令。帝为晋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后，令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遂以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迁将军。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兽幡在乘舆左右，卤簿陈列齐肃。”[④]《宋书·百官志》载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的职掌有“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⑤]，推测陈勰所迁之“将军”即殿中将军，而大驾卤簿中与殿中诸职并列的“典兵中郎”或即殿中典兵中郎将。又“殿中监”之职掌，史籍虽无明载，但《晋书·刘超传》载苏峻曾“以其所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⑥] 则东晋时殿中监与司马督同为殿中宿卫之职，或可由此稍推知西晋情况。综上言之，以前部相风为界，其后便进入殿中诸职及左右卫将军护卫的金根车，此乃大驾卤簿最核心的部分。而后部相风与皇帝车驾仅隔着曲华盖、黄钺车等两行仪仗，应当也有观风护驾之意涵。

晋唐之间大驾卤簿的构成缺乏完备的记录，唐代的情况则可依凭《新唐书·仪卫志》，将大驾卤簿中相风至皇帝车驾的部分列表如下：[⑦]

表二

左	中道	右
	太史监、书令史	
	相风舆	
	拥鼓、金钲	
	行漏舆	
	持钑前队	
御马 12		御马 12
青龙旗		白虎旗
	尚乘奉御 2、书令史 2	
左右卫果毅都尉（各领 25 骑）		
通事舍人 4		通事舍人 4

①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第 741 页。
② 《宋书》卷四十《百官志》，第 1249—1250 页。
③ 关于魏晋时期的宿卫官，参看陈苏镇《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67—85 页。
④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第 741 页。
⑤ 《宋书》卷四十《百官志》，第 1249—1250 页。
⑥ 《晋书》卷七十《刘超传》，第 1876 页。
⑦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三《仪卫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481 页。

（续表）

左	中道	右
侍御史		侍御史
御史中丞		御史中丞
左拾遗		右拾遗
左补阙		右补阙
起居郎		起居舍人
谏议大夫		谏议大夫
给事中 2		中书舍人 2
黄门侍郎 2		中书侍郎 2
左散骑常侍		右散骑常侍
侍中 2		中书令 2
	香蹬	
左卫将军		右卫将军
左卫亲卫 53		右卫亲卫 53
左卫亲卫 55		右卫亲卫 55
左卫勋卫 57		右卫勋卫 57
左卫勋卫 59		右卫勋卫 59
左卫翊卫 61		右卫翊卫 61
左卫翊卫 63		右卫翊卫 63
左卫翊卫 65		右卫翊卫 65
左骁卫〔翊卫〕67		右骁卫〔翊卫〕67
左武卫翊卫 69		右武卫翊卫 69
左威卫翊卫 71		右威卫翊卫 71
左领军卫翊卫 73		右领军卫翊卫 73
左金吾卫翊卫 75		右金吾卫翊卫 75
左卫郎将（领散手翊卫 30）		右卫郎将（领散手翊卫 30）
左骁卫郎将（领翊卫 28）		右骁卫郎将（领翊卫 28）
左卫供奉中郎将、左卫供奉郎将、右卫供奉中郎将、右卫供奉郎将 （领亲卫 48、勋卫 48、翊卫 48）		
	玉路	

按《大唐开元礼》卷二“序例”亦载大驾卤簿，但对“班剑仪刀队”的记载阙略，故此处采用《新唐志》。《新唐志》反映的大驾卤簿结构与《开元礼》基本一致但小有出入，若不考虑《新唐志》对原始材料的删改，二者仍有“太史监”和“太史令”之别，且《新唐志》有“书令史”而《开元礼》无。按天宝元年（742）以前，太史局在独立为监和隶属于秘书省为局之间有过多次变动，独立为监时长官为太史监，并配令史、书令史，隶属秘书省为局时，长官为太史令，胥吏亦改为府、史。① 据《唐会要》卷四十四《太史局》，开元年间仅有开元十四年（726）至天宝元年（742）为太史局、隶秘书省②，则《开元礼》表现的当为开元十四年至二十年成书时的情况③，《新唐志》或据天宝以后的制度。相风在唐代大驾卤簿中的使用有其实例，如法轮《观大驾出叙事寄怀》云：“轻霞照复道，徐吹转相风。”④

野田有纪子指出，晋朝大驾卤簿中，车辇、鼓吹、皇帝车舆的顺序是前部鼓吹—车辇—皇帝车舆—车辇—后部鼓吹，车辇与皇帝的距离较近，而唐代大驾卤簿则变为车辇—前部鼓吹—皇帝车舆—后部鼓吹—车辇，加之皇帝车舆前后集中了大量供奉官和仪仗兵，拉开了车辇与皇帝之间的距离。⑤ 这一线索对于理解相风在卤簿中的衰落同样具有启发性。如上所述，在西晋大驾卤簿中，前部相风之后紧接着卤簿的核心部分，即殿中诸职所护卫的皇帝车驾，相风导引銮驾的象征意义十分突出，前、后部相风皆距皇帝车驾较近。至唐代，大驾卤簿人数大增，相风与皇帝乘坐的玉路之间又增入了持钺前队、御马队、青龙白虎旗、左右卫果毅都尉所领之旗队、中书、门下官员组成的供奉官及数量瞩目的南衙诸卫仪仗兵⑥，除持钺前队人数未知外，其余共有 2094 人，相风与皇帝车驾之间的距离较之西晋拉长数倍。另一方面，可以注意到，相风在唐代大驾卤簿中被归入太史监所引领的“天文仪器”方阵，与相风同在此方阵中的还有行漏舆，这微妙地削弱了相风在大驾卤簿中的独立性。按行漏舆在帝王卤簿中与相风并列或始于南北朝。如梁庾肩吾《侍宴九日诗》云“秋辉逐行漏，朔气绕相风”⑦，《隋书》载萧梁之制“近谴则队仗”⑧，则梁代皇帝重九燕享不备三驾而用队仗；又如北周宗庙歌辞曰“鼓移行漏，风转相乌”⑨，北周宗庙祭祀用何种帝王卤簿难以考确，但由此二例可知南北朝时行漏

① 叶炜《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的文书胥吏》，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309—310 页。

② 王溥《唐会要》卷四十四《太史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931 页。

③ 以往多认为《大唐开元礼》所据为开元七年令，仁井田陞也多据《开元礼》复原开元七年令，但不少学者已指出，《开元礼》也吸收了不少开元七年至二十年的新制，而且这些规定并非都以“令”的形式出现，也有来自式和制敕的内容。吴丽娛指出《开元礼》卷二《序例中・大驾卤簿》中关于诸卫大将军、中军、郎将衣文的规定，实来自开元十一年六月敕文。而从“太史令”乃开元十四年以后之制度亦可看出《开元礼》“大驾卤簿”的编纂痕迹，其所依凭之文本非一。关于《大唐开元礼》较新的研究，可参看吴丽娛《以法统礼：〈大唐开元礼〉的序例通则——以〈开元礼・序例〉中的令式制敕为中心》，《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 4 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 181—206 页；赵晶《唐令复原所据史料检证——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文史哲》2018 年第 2 期，第 122—133 页。

④ 法轮《观大驾出叙事寄怀》，《全唐诗》卷八百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9626 页。

⑤ 野田有紀子《日本古代の行列：国家秩序の表象》，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论文，2001 年，第 9—10 页。

⑥ 唐代大驾卤簿的特征颇受北魏传统的影响，关于此点可参看马冬《唐代大驾卤簿服饰研究》，《文史》2009 年第 2 期，第 107—110 页。

⑦ 《初学记》卷四《岁时部》，第 81 页。

⑧ 《隋书》卷十二《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80 页。

⑨ 《隋书》卷十四《音乐志》，第 370 页。

已进入帝王卤簿且与相风在队列中前后相续。这或许也是承袭了前代类书的《北堂书钞》将“漏刻”和“相风”以前后相序的方式并列于仪饰部的原因。①

北宋大驾卤簿的繁复花哨较唐代更进一步，可以《宋史·仪卫志》“国初卤簿”所载大驾卤簿为例。② 按《宋志》大驾卤簿的具体年代，据其中的“司天监”，可知为元丰易名“太史局”前的制度，或本自神宗以前国史。结合《大唐开元礼》和《新唐书·仪卫志》来看，北宋前期的大驾卤簿对唐制多有承继。就相风舆与皇帝车驾之间的仪仗而言，其中持钺前队、班剑仪刀队、五仗、导驾官等的构成和人数都与唐代基本一致，但另一方面，其间又增入主要由无职事环卫官和六军组成的前部马队、步甲前队、前部黄麾仗、六军仪仗、引驾旗等旗队、左右骁卫·翊卫三队、金吾细仗、左右卫夹毂队，以及捧日·奉宸队、殿中省仗、诞马等，相风与皇帝车驾的距离更为遥远。而就相风所在的司天监方阵而言，《宋史·仪卫志》载：“次司天监一人，骑，引相风、刻漏，中道。令史一人，排列官二人，骑从。相风乌舆一，匠人一。交龙钲、鼓各一，司晨、典事各一人骑从。钟楼、鼓楼各一，行漏舆一，漏刻生四人从。清道二人，十二神舆一。司天官一人押。”③ 交龙钲、鼓舆及钟楼、鼓楼舆、十二神舆的加入无疑使相风的独立性进一步消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描绘宋代大驾卤簿出行的《大驾卤簿图书》，学者认为此画表现的是北宋皇祐时期的制度，画中有相风乌舆和行漏舆，但未有钟、鼓楼舆及十二神舆等④，可推知相风所在方阵的扩充应当在皇祐至治平二年（1065）之间。与此同时，宋代卤簿中的相风又较中古时期的“根盘神兽，颠据灵乌”有所简化。成书于治平二年的《太常因革礼》卷二十二载：“相风乌舆，上载长竿，梢刻木为乌，垂鹅毛笴，红绶带，下承以小盘，周以绯裙，绣乌形，舆士四人，服绣乌。交龙钲、鼓舆各一，刻木为二青龙相交，下有木台、长竿，一挂画鼓，一挂金钲，上皆有绯盖，亦绣交龙，舆士各二人。钟鼓楼舆各一……皆刻木为屋，中置钟、鼓，下施木台、长竿，如钲、鼓舆。”⑤ 由此看来，与同方阵乃至整个大驾卤簿的其他旗帜、车舆相比，相风的形态也不再特别。南宋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大驾卤簿不得不较前朝有所减省⑥，司天监（太史令）方阵与其前方的指南车等属车方阵一同被裁撤，《中兴礼书》载录的大驾卤簿中已然不见相风⑦，法驾和小驾中相风或许也不再行用。与此相应，不同于两晋南北朝及唐代的帝王出行诗惯用相风作为意象，有宋一代的卤簿诗提及相风者，目之所及仅有北宋早期宋庠《乾元节祝圣寿颂》：“若乃缇帷宿设，藻卫环列。铜乌递风而细转，玉虬注漏以迟度。”⑧ 北宋后期和南宋的用例则几不可见。

---

①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影钞本，第 551 页。
② 《宋史》卷一百四十五《仪卫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408—3418 页。
③ 《宋史》卷一百四十五《仪卫志》，第 3409—3410 页。
④ 画卷全图未得寓目，相关信息来自陈鹏程《旧题〈大驾卤簿图书·中道〉研究——“延佑卤簿”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 年第 2 期，第 76—85 页。关于此图的相关研究还可参看［美］伊沛霞《大驾卤簿：皇家胜景和北宋开封的视觉文化》，段晓琳译，《历史文献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31—155 页。
⑤ 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卷二十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38 页。
⑥ 朱溢《南宋大礼卤簿制度及其实践》，《人文论丛》2019 年第 2 期，第 142—154 页。
⑦ 《中兴礼书》卷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 82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80 页。
⑧ 宋庠《乾元节祝圣寿颂》，《元宪集》卷十六，《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64 页。

综上可以勾勒出西晋到南宋大驾卤簿中相风的演变轨迹：西晋时，相风紧挨殿中诸职—金根车，真正发挥奉引銮驾的功能，由唐至北宋，相风逐步淡化为与卤簿中其他车舆无甚区别的普通仪仗，与皇帝车驾的距离也不断疏远，南宋时，随着司天监方阵与指南车等各色属车被裁撤，相风自此从大驾卤簿中退场。

最后可对相风在大驾卤簿中的具体行用方式稍作讨论。据《晋志》“中朝大驾卤簿”，相风既无“驾”亦无“骑”，当是执士手执。虽然与“中朝大驾卤簿”所出同源的《杂记》称“相风乌车驾四，中道”，但考虑到后者对原始文献的损益，暂从《晋志》。又上举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帝王卤簿图中，相风与羁、罕一样为执士手执，但从该图的规模来看，其表现的或许并非大驾。唐代和北宋，相风在大驾卤簿中以“相风舆”或“相风乌舆”的形式出现，可知其立于车舆上。又前引沈佺期《扈从出长安应制》云：“西宾让东主，法驾幸田中。……金麾张画月，珠幰戴相风”①，按“幰”即车幔。可知唐代在规格较低的法驾中，相风亦以车舆载之，但未知在小驾中，相风会否简化为手执。

小　结

综上所述，“甘泉卤簿”条最初乃是两晋好事者在《中朝大驾卤簿》或其同源文本的基础上减损增益、附会造作而成，后为葛洪采入《杂记》，既不能据此讨论汉制，也不能视之为晋制。以往学者基于《杂记》“甘泉卤簿”条认为西汉帝王卤簿中已有相风的结论难以成立。不过，由于《杂记》此条与《晋志》“中朝大驾卤簿”所出同源，其文字错讹虽多，却也不乏校勘价值。

从现有材料来看，相风进入卤簿的时间或晚至西晋。在西晋大驾卤簿中，相风在皇帝车驾前后共出现两次，前部相风以单个仪仗的形式居于殿中诸职及其护卫的金根车之前，直接引领卤簿中最核心的部分，与皇帝车驾的联系十分紧密。至迟到唐代，相风在大驾卤簿中与行漏一同被归入太史监方阵，北宋时太史令方阵又增交龙钲、鼓舆及钟楼、鼓楼舆、十二神舆，这使得相风的独立性日益消泯，同时相风之形制较中古时有所简化，并不较其他车舆更为华丽或特殊。另一方面，由西晋至唐宋，大驾卤簿的规模不断扩充，相风与皇帝车驾间的距离变得愈发遥远，进一步削弱了相风之于大驾卤簿的重要性。于是宋室南迁后，相风舆与其前方的指南车等属车一同被减省，后代亦不复见于卤簿仪仗中。

① 沈佺期《扈从出长安应制》，《沈佺期集校注》卷一，第 60 页。